

美国大学转型时期关于“去行政化”的 论争及其思考

刘爱生

(浙江师范大学 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美国大学在转型时期同样面临着去行政化的议题，并引发社会各界激烈争论。在此过程中，形成三种主要观点：一是“激进的重建观”，以索尔斯坦·凡勃伦为代表，认为董事会和校长应该废除，完全实行教授自治；二是“适度的调整观”，以詹姆斯·卡特为代表，主张董事会和校长应予以保留，但改变其构成，大幅度削弱其权力；三是“理性的合作观”，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这些群体为代表，他们承认美国大学治理系统的总体框架，但要求行政人员与教师分工与合作。这些论争在思想上为美国大学的去行政化作好了铺垫。反思同处转型时期中国大学的去行政化，还需要扩大相关讨论的广度和深度，保持耐心与理性，以及初步制定去行政化的行动框架。

关键词：美国大学；转型时期；去行政化；重建；调整；合作

作者简介：刘爱生（1984—），男，江西余干人，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学一级学科基地一般招标课题“大学有效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ZJJYX2014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6)01-0105-08 **收稿日期：**2016-01-15

“行政化”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官僚化”或“官本位”；大学去行政化的核心思想是：抑制大学里的官僚文化和行政文化，改变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不断侵蚀，张扬学术权力，恢复大学尊严，最终让大学回归大学，学术回归学术。^[1]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去行政化绝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回顾美国高教史可以发现，美国大学在转型时期（1861—1945年）

也面临着去行政化的问题，并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下文将分析这场关于“去行政化”争论的时代背景和主要观点，并思考它对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启示意义。

一、美国大学转型的背景

“在美国漫长的区域性冲突史上，美国内战的爆发是美国大学进入转型时期的标志性事件。”^{[2][9]}在

关于美国大学转型时期的划分，美国的高教史专家一般以美国内战的爆发作为起点，以“二战”的结束作为终点。它是指美国现代大学制度从确立到巩固的这段时间。

这一转型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呈现出三个特点:(1)办学规模扩大,大学行政管理开始官僚化;(2)新型教师群体出现,但地位不高;(3)商人取代牧师成为新董事会成员的主体,但形象不佳。这些特点从总体上奠定了美国大学转型时期关于去行政化争论的基调。

(一)大学行政管理的官僚化

19世纪末期,美国开始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随之发生巨大改变:(1)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各行各业对高素质的大学人口的需求激增,大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2)随着科学管理的兴起,大学不再被视为一个松散的、随机的组织,而是一个应予以标准化和集中化的机构。^{[3]5}在此过程中,大学开始不断借鉴商业机构的原则与做法,并建立了一套非人性化的官僚主义体系。其中,校长作为董事会的代表,在校内处于权力的最顶层;校长然后把一部分权力委托给中层的教务长和副校长,并任命学院院长执掌每个学院;教师开始出现职务等级的差别,进而形成了一个由注册主任、行政主管、资产经营部经理、校友会主任等人员组成的官僚体系。

与大学行政管理官僚化相随的是:(1)管理人员数量不断膨胀,大量的资源也被用于行政管理。例如,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办公室人员就包括3名秘书、5名速记员和2名勤杂工,仅用在一等邮件上的邮费就达800美元。^[4](2)大学权力不断转移和操纵在行政管理者个人和部门手中,大学权力日益个人化和部门化。由于缺乏权力的制衡,美国大学的行政化发生了异化,“即从基于组织的扩张和发展转向基于个体权力和官位的扩张和展示,从基于服务和激励转向基于支配和控制”^[5]。

(二)新型大学教师群体地位不高

美国内战结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即便在最好的大学,教师的角色更像是教官而非教师,主要起到管训学生的作用。在课堂上,学生一遍又一遍地背诵课文,教师仅仅是一个聆听者。随着美国留德人员的返回,以及大学研究生院的建立,这些新型教师群体开始谴责并抛弃这一传统的伪教学。由于拥有研究导向的哲学博士学位,他们拒绝花费大量时间用在学生的管教上,而是转向专业领域。到20世纪初,为了提升他们的学科利益和自身地位,这些新教师群体主张学术自

由和职业专业化,并且成立了各种学术协会组织。教师的某些权利诉求也得到了学校的回应。例如,在1880年左右,哈佛大学实行教师学术休假制度,这一制度迅速传播开来,并成为教师聘用中的一些福利和协商筹码。

然而,当时美国大学教师的地位仍然不高。第一,他们在学校基本的教育政策制定,例如校长、院长的遴选,教师的聘用与晋升以及其他院校事务上仍没有决定权,有些甚至没有参与权。第二,无论是法院,还是董事会,只把教师视为学校的雇员,而不是大学的主人,董事会可以随意解雇他们。总之,在这一时期,尽管教师待遇有所提升,并且获得一些权力,但所享有的地位比他们想象中的要低。

(三)新的大学董事形象不佳

19世纪中后叶,在工业化和世俗化的双重影响下,美国大学最终摆脱了教权的控制,商人(主要是富豪)及相关人员取代牧师成为董事会成员的重要构成。不过,这些新生的董事会成员仍用一种狭隘的眼光看待教师的权利。在他们看来,教师群体的地位是低下的。他们不仅反对学术自治,而且干预教学内容。

令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美国社会非常腐败,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仇富”心理非常严重,人们对以石油、铁路、银行巨头为首的商人充满厌恶和恐惧之心。根据20世纪初的一项估计,当时美国1%的家庭控制着全国88%的财富资产。除个别富豪(比如卡内基)过得相对朴素外,大部分富豪生活在近乎变态的奢侈当中。最声名狼藉的一个例子是布拉德利·马丁(Bradley Martin)夫人花36.8万美元出席一场社交舞会,这一举动引起民众公愤。此外,这些富翁们的成功并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单纯靠艰苦奋斗和聪明才智,同样也是残酷、自大、猖狂腐败的结果。铁路巨头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富于挑战性的问题代表了许多商业巨头的根本态度:“难道我就不能靠自己为所欲为吗?”有一次,范德比尔特的律师警告他某些行为非法,他却咆哮道:“我管那些法律干什么?我的权力不就是法吗?”^{[6]506}

美国大学董事的独断与自负,兼之“为富不仁”的社会形象,加剧了教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美国学者沃特·梅兹格(Walter P. Metzger)就指出,商人作为坏人的印象成为美国大学特有的现象。在教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殉教史中,商人在仅仅

几十年的时间,就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7]166}

二、大学去行政化的三种论争

一边是大学管理的官僚化,一边是主张学术自由的新型教师队伍,一边是社会形象不佳、傲慢的董事会成员。这三股力量结合在一起,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矛盾。综合考利(Cowley)等人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论争大致有三种论调:一是“激进的重建观”,以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为代表,他认为外部董事会和校长应该废除,完全实行教授自治;二是“适度的调整观”,以詹姆斯·卡特(James McKeen Cattell, 1860—1944)为代表,他主张外行董事会和校长应予以保留,但改变其构成,大幅度削弱其权力;三是“理性的合作观”,在历史上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这些群体为代表,他们承认美国大学治理系统的总体框架,但要求行政人员与教师在大学治理中分工与合作。^{[8]199-200}

(一)激进的重建观

早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就开始意识到德国大学的兴盛。自那时起,美国人就开始了留德之路,并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此后随着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建立,这一数字逐渐下降,但即便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留德的美国学生总人数仍达到一万人。其中一些吸取了德国文化和教育思想的美国人,一回国就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美国高等教育重建的工作中去。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学术治理系统显得不合时宜,主要表现为校长一人掌权和董事会干预纯学术事务。与此相反,德国大学的优越性体现在其治理系统:(1)教授享有特权;(2)坚守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尽管后来随着“一战”的爆发和希特勒的独裁,绝大多数美国教授对德国大学治理系统的美好幻想破灭了,但对德国大学理念的迷思却经久不衰。这其中有一个代表就是索尔斯坦·凡勃伦。

凡勃伦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鼻祖。他以对资本主义的辛辣批判被美国公众所知,而这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是《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就其学术生涯而言,可谓一波三折。从耶鲁大学毕业多年后,他才在芝加哥大学谋得一教职,但1904年被校方辞退。在校方看来,凡勃伦是一名生活作

风不良、政治激进主义者。1905年他来到斯坦福大学,但5年后因同样的原因被辞退。1911年,他来到了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并于1918年出版了批判美国高等教育的力作《论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9]

在他眼中,大学应是一个毫无功利地追求知识、倡导知识和传授知识的文化机构。在这种机构里,教师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较少束缚的、无竞争性的学术共同体,他们理应拥有自治的权力而不受外部的控制。然而,随着商业原则侵入学术共同体中,大学成为一个充满竞争性的企业。在商业原则主导下,大学产生了一个严格的管理体系,即“一个将骨干员工按等级排序的管理体系,一个严格的组织和提供指导的标准化管理体系”^{[10]112}。在这种体系中,董事会和校长拥有不可分割的权力,可以对教职工自主行使生杀大权,奖励优秀、忠实的雇员,处罚不服指挥者。与此相对应,全体教职工变成了一群“二等公民”、一群雇工,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分享董事会和校长的自信,但没有决定性的参与权。

由于学术研究必须被授予充分的自主权,不可能在强制性的规则下和一个具有高官身份的外行人的统治下有效运行,据此凡勃伦认为:第一,就大学财政事务及其相应的管理而言,大学完全可以毫无损害地省却董事会的运作。因为“这些商人董事会对大学任何实效性目标通常毫无价值”,相反只会“毫无意义地胡乱干预其并不通晓的学术事务”^{[10]191-92}。第二,就高等教育的日常工作来说,权力阶层和官僚政治的附属机构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或根本没有什么用处;而且,统计上的一致性、学识的标准化或烦琐的会计工作,在大学工作更非完全切实可行。总之,“从高等教育的观点来看,大学行政主管及其所有工作都是被诅咒的,应该轻而易举地将其废止;而董事会,除了徒有虚名的、马马虎虎的职责外,就其假定的运作来说,也同样没有什么价值,应该在同一次‘洗牌’中率先出局”^{[10]240}。

从中可见,凡勃伦的论断是相当激进的,但他代表了当时及后来一部分人的观点。例如,1913年威斯康星大学约瑟夫·贾斯特罗(Joseph Jastrow)教授在一篇名为《行政之危害》(*The Administrative Peril*)的文章中写道:“最大的危险、让高等教育前景堪忧的最大因素,是行政的过度控制。”^{[8]208}再如,1919年美国某大学校园设

计师只安排了一个规模很小的建筑供行政人员使用,并把它置于一个不显眼、不方便的位置。他如此安排的理由是:“行政的存在仅仅是用于服务大学的……因而我把行政人员和教师隔离开来,如此他们有可能成为好的服务人员,因为他们篡夺大学的核心位置时……他们将成为最糟糕的主人。”^{[8]208}

(二)适度的调整观

一开始,美国一些更为实际的学者就知道,德国的学术治理模式无法移植到美国。因为在德国大学的治理中,两项重要的权力掌握在德国每一个州政府的教育部手里:(1)财政控制,包括预算的拟定和批准、基金和建筑的管理;(2)学术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由教育部任命,他们是公务员身份。如果要采纳德国大学模式,意味着不仅美国州立大学,而且包括私立大学,都将受到州政府代理人或教育主管的财政控制。而这显然与美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在此情况下,当中的一些人并不认同凡勃伦所代表的激进观点,而走上了调整之路。这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詹姆斯·卡特,美国第一位心理学家,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的编辑与出版者。他出生在一个富有且显赫的家庭里,父亲威廉·卡特(William Cassady Cattell)是一名长老会牧师,曾担任拉斐特学院(Lafayette College)的校长一职。^[11]这种家庭背景,外加留德经历,或许影响到他对美国大学董事会、校长以及其他行政人员的看法。

在卡特看来,大学的控制应掌握在教授手中,而非外行的董事会。在大学治理中,董事会扮演了一种不光彩的角色——盗贼统治(kleptocracy);校长一职只是一种学术消遣(academic pastime)。他曾在公开演讲中和《科学》杂志中多次讽刺校长。他曾说道:校长就其本性而言,是真诚的、令人尊敬的和善良的,且还可能拥有超过常人的能力或事业心,或二者兼有。但他会真切地发现自己处在一种难堪的境地之中:他只有辞职,才能缓和他在校园中的专制;同时,他又必须表现得高尚,才可在公众中间树立起良好的形象。^{[12]31}

然而,卡特并没有像勃凡伦那样走向极端,因为他知道,根据美国的法律,美国的大学都是依据特许状而成立的财产,必须由受托人委员会或监事会来控制。针对这一情况,他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提出削弱董事会的最终决定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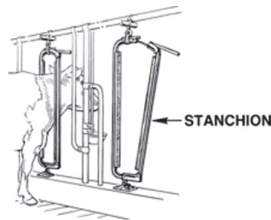
校长的决策权,增加学术人员在董事会中的比重,提升大学下属每个学术单元(院或系)的财政和教育的自治权,等等。

第二位具有影响力的适度调整主义者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878—1968),一位以写黑幕揭发题材小说而闻名的美国著名作家。他一生写了将近100本书,涵盖各个领域;闻名于整个20世纪上半叶,并于1943年荣获普利策小说奖。^[13]他在1923年出版的《正步走:美国教育研究》(The Goose-step: A Study of American Education)中写道,美国的大学已被大资本家们(通过联合董事会)所控制,“我们的教育系统不是一项公共服务,而是特权阶层的工具;其目的不是提升人类的福祉,而仅仅是维护美国资本主义”^{[14]18}。他还说道,校长仅仅服务于董事会,而非学生的利益。行政人员也大量由那些不合格但政治保守的人员占据着。教师由于担心被解雇,无法自由地言论,且董事会会通过校长压制任何对现状的批评。对于教师的地位,辛克莱在书中这样写道:“我曾与芝加哥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交谈过。我问他是如何评价自身的专业地位的,他给了我迄今所听到的最好的关于美国学术自由的描述。他说,我们是很好的奶牛;我们在拴牛棚(stanchion)中静静地站着,并定时地挤出牛奶。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任

盗贼统治意为“rule by thieves”,指一种政治或政府腐败,其中政府存在的目的只在于增加个人财富和政治权力,其代价是牺牲大众的利益。这种类型的政府腐败往往是通过盗用政府资金而实现。更多内容请参考:Wikipedia. Kleptocracy[EB/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Kleptocracy>.

作者用“正步走”作为书的题目,来源于德国普鲁士军队那种独裁、划一的文化,暗指美国大学生被训练成像德国学生一样,只会人云亦云,不会独立思考。在他看来,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美国主要大学的校长,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纽约大学,都曾在德国学习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学习过德国皇帝的正步走”。——从这一题目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品尝到作者的讽刺味道。进一步的阅读请参考:Wikipedia. The Goose-step(book)[EB/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Goose-Step_\(book\)](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Goose-Step_(book)).

stanchion并没有相对应的中文名词,这里暂且把它译为“拴牛棚”。作者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教师的自由空间非常有限。图片来源:Wikipedia.Stanchion[EB/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anchion>.



何事情的欲望,除了被告知我们应该做哪些。而且我们死于早衰。^{[14] 247}

但与凡勃伦不同,辛克莱没有废除董事会、校长的想法。作为一个虔诚的社会主义者,他更多地主张降低美国富人在学术事务上的影响力,充分实现教师的学术自由。他提议应建立一所“美国文学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Literature),董事会成员由“当时最高尚、最诚实、最受人尊敬的文学家组成”^[15],而不是那些大腹便便的富豪。当时还有不少持与卡特、辛克莱相类似观点的学者。可以说,他们关于美国大学如何去行政化的论断,有些是十分浪漫的。例如,削弱董事会的最终决策权,或者让文学家担任大学董事会成员,都是不切实际的。但相比凡勃伦的激进,他们的观点又是温和的,这里故称之为适度的调整观。

(三)理性的合作观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不认同前两者的观点。保罗·摩尔(Paul Elmer More, 1864—1937),美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批评家、散文家、基督教辩护士,早期曾在哈佛大学(1894—1895年)和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 (1895—1897年)执教,后投身于大众媒介领域。^[16]他1913年在一篇名为《学术专制》(*Academic Autocracy*)的文章中指出:“成千上万名自尊的绅士们仍在美国大学教学这一简单的事实证明:大学校长通常不是心胸狭窄的暴君,董事会成员既不无知也不专横。在徒具虚名的董事会控制下,教师有足够的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怀疑大学校长和董事会是多余的——那是德国大学教师的观点,最近则受到卡特教授观点的暗示。事实并非如此,董事会是大学得以持续发展的逻辑产物。我们相信,假如美国大学没有董事会,大学为了摆脱破产的厄运,人们也会发明它。”^[17]

同样,卡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 1844—1931)——美国政治科学的创始人,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科学家”^[18],并不认为董事会扮演了“盗贼统治”的角色,而是认为董事会是由一群绅士结成的志愿联盟。他们为了最高的文化,承担起创建和维持大学的责任。“对他们而言,不仅没有任何金钱上的补偿,而且还要无私地付出时间、精力和物质。”^[19]

以上观点还得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

的支持与认可。AAUP作为由大学教授组成的组织,成立之际就力求避免卷入学术自由的纷争之中,反对教师与校长、董事会之间形成一种破坏性或敌对的情绪。AAUP的奠基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 1873—1962),美国著名哲学家,批判实在论的重要代表,“观念史”学科的创始人^[20],尽管强烈支持扩大教师的权力范围,但认为最终的决策权仍属于董事会。AAUP的第一任主席杜威也赞同洛夫乔伊的观点,认为教育主要是一项公共事业,外行人在制定政策和确立教育机构目的中应具有重大的发言权。杜威同样认可校长这一职位的重要性。1915年8月,他对美国最有权力的大学校长——美国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AC)的成员,发表的一场演讲中就期望AAUP和AAC之间建立一种相互理解和精诚合作的关系,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利益。^{[21] 32}

1920年,AAUP发表了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关于教师在大学治理和管理中的定位和功能的报告》。这份报告试图为教师参与大学治理和管理确立一些基本原则,可以说是美国高教史第一份如何就大学去行政化的行动框架。

该报告首先指出,美国大学的治理并非像有些人批判的那样十分专制。虽然美国大学在法律上是专制的,因为依据特许状董事会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在实际运行中还是比较民主的,教师在入学标准、课程内容、学位要求、教师评聘,甚至有时在校长与院长的遴选上,还是有巨大影响力的。除了个别董事冒充教育专家,干预大学内部事务外,多数情况下大学董事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们不会控制教育政策,而是把权力委托给大学校长。

报告接着指出,专制的大学治理固然行不通,但如果像凡勃伦所设想的那样,大学完全由教授自治也是行不通的,理由如下:权力与责任的分散会导致效率的低下;大学将缺乏进取心和领导力;大学治理和管理中,将会大量地充满个体化的行为政治斗争;教师将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行政工作,这会极大地影响其作为教师和研究者的本职工作。

报告最后指出,为了公共利益,董事会不应在一切教育事务上(包括大学里的教职工)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教师也不要幻想完全的自治,而应是双方形成一种共同担责和全面合作的精神,

即依据大学事务的不同性质,承担不同的职责和权利。例如,董事会在经费使用上负主要责任,在行政人员的遴选、教师的聘任上拥有最终的决策权,因为他们是大学的监护人,但他们在适当的时候,需考虑教师的意见;在教育政策的决定和执行上,教师是专家,在决策中应具有主要的发言权。但有时候,为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教师可能需要听从董事会的意见,在教育政策制订或实施中作一些变化与改进。^{[22]17-47}

可见,AAUP的创建者们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态度是相当理性的。他们深知,完全的教授自治是走不通的;唯有在大学治理中寻求分工与合作,而非走向对抗,才有可能使高等教育服务于人类的福祉。

三、结语与思考

无论是“激进的重建观”,还是“适度的调整观”,抑或“理性的合作观”,都是美国大学转型时期美国整个社会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思考。几乎每一种论争,都有其合理与可取之处,而且一些论述相当出彩。有些观点,现在读起来都令人振聋发聩。例如,凡勃伦所讲到的大学公司化、标准化问题,一直延存至今。显然,这些论争为美国大学的去行政化在思想上作好了铺垫。尽管后来美国高等教育采纳了最后一种观点,其标志是AAUP、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和美国大学和学院董事会协会(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GB)1966年联合发布《学院与大学治理声明》,正式提出大学共同治理模式。但是,凡勃伦所提出的提高教师在学校里的身份与地位,要求具有参与权和决策权,卡特所提出的削弱董事会、校长的权力,增加二级学院的自主性,辛克莱所提到的改善董事会成员的结构(包括提升其形象)、保障学术自由等,都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核心要义所在。当前,我国大学正处于转型之期,其中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个核心问题。本文将结合美国大学转型时期关于去行政化的论争,略谈几点认识和思考。

(一)拓展大学去行政化讨论的广度与深度

综观美国大学去行政化的论争,可以发现:(1)论争不仅发生在学术圈内,而且发生在学术圈外。例如,辛克莱是小说家,并不在高校从事教学;摩尔当时已经在新闻媒体工作。(2)论争

主要由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或社会名流发起(这是文中不厌其烦地介绍论争者背景的原因所在)。诚如前文所言,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卡特是现代心理学的开创者,伯吉斯是政治科学的创始人,辛克莱是普利策奖获得者,摩尔集多种头衔于一身,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辩护士”,等等。这两大特点,无疑会极大地促进有关大学去行政化讨论的广度与深度。

反观国内,虽然有关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很多,但主要局限在高等教育学界,发起者大部分是教育学者。这里不禁要问:为什么很少见到圈外名人志士有力的批判?为什么很少见到其他学科的著名教授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难道他们不受行政化之害吗?不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状况势必会大大降低大学去行政化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进而不利于全面、有效地推动相关方面的改革。因此,中国大学想要真正意义上“去行政化”,除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外,还需要自下而上的广泛争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中国的著名教授已经成为高校的“新贵”,拥有某种“特权”,大学的行政化并不伤害自身的发展。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前景就不妙。

(二)在去行政化的过程中保持耐心、坚守理性

大学去行政化决非一日之功就能完成的。综观美国大学去行政化之路,可以发现,它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如果以美国大学进入转型期的第一年(1861年)算起,到1966年AAUP、ACE和AGB联合颁布《学院与大学治理声明》正式提出行政人员与教师“共同治理”并使之合法化,标志着大学去行政化的使命正式完成,那么,美国大学去行政化之路历经一个多世纪,这还不算美国大学进入转型之前教师与董事会、校长之间漫长的斗争。当前,国内要求大学去行政化的诉求非常急切,恨不得三五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即便美国这样年轻、没有历史包袱的国家,大学去行政化之路尚且如此漫长,像我们这样历史悠久、包袱沉重的国家,恐怕也将经历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对此,我们

这份声明详细阐述了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角色并将之合法化,并提出大学董事、行政人员和教师应该相互理解、相互依赖和共同努力。追根溯源,可以发现,这份报告实乃对1920年发表《关于教师在大学治理和行政中的定位和功能的报告》的细化,是对当时提出的“共同担责和全面合作”的回应。

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另外,在大学去行政化的论争中要保持理性。在美国大学去行政化的论争中,有各种声音,但最终AAUP赢得这场论争的胜利。在笔者看来,这是理性的胜利,因为AAUP没有像凡勃伦那样只抓住一点而不放,或者像辛克莱一样主要基于个人的喜恶;相反,AAUP提出的大学去行政化的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深刻的调查与协商之上。AAUP为了完成《关于教师在大学治理和行政中的定位和功能的报告》,在大量实证调研基础上,先后三易其稿,召开了四次会议,前后经历三年时间(1917年接受任务,1920年正式完成)。综观我国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争论,虽然充满各种见解,但多是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思辨之言,很难说是理性的、客观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鉴于此,今后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研究,有必要开展大规模的实证调研,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思辨;各路专

家学者也有必要就此问题展开特别讨论,而不是自话自说。

(三)拟定大学去行政化的行动框架

1920年,AAUP发表《关于教师在大学治理和行政中的定位和功能的报告》,首次提出行政人员与教师“共同担责和全面合作”,初步制定了大学去行政化的行动框架。此后,美国大学的去行政化路径,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框架而展开。目前,中国大学并没有一个类似的、详细的行动纲领,要么继续停留在去行政化的口号阶段,要么是基于某一经验实施去行政化,这一状况显然不利于中国大学全面地推动去行政化。因此,中国大学非常有必要在理性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内外高校去行政化的经验与成果,拟定一个中国版的大学去行政化的具体行动框架。这样一是有利于进一步达成共识,二是有利于推动下一步的行动。

参考文献

- [1] 王建华. 中国大学转型与去行政化[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2, (1).
- [2] 亚瑟·科恩. 美国高等教育通史[M]. 李子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3] Wilson.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applications to academic administration[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1.
- [4] 刘爱生, 顾建民. 美国大学的去行政化之路[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 (4).
- [5] 郝海霞. 美国大学的行政化及去行政化改革[J]. 外国教育研究, 2014, (11).
- [6] 艾伦·布林克利. 美国史(1492~1997)[M]. 邵旭东,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9.
- [7] 沃特·梅兹格. 美国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M]. 李子江, 罗慧芳,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8] Cowley C W. Presidents, professors and trustees: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academic government[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0.
- [9] Wikipedia. Thorstein Veblen[EB/OL].[2015-01-01].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orstein_Veblen.
- [10] 索尔斯坦·凡勃伦. 学与商的博弈: 论美国高等教育[M]. 惠圣, 译. 上海: 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 [11] Wikipedia. James McKeen Cattell[EB/OL].[2015-01-0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McKeen_Cattell.
- [12] Cattell J M. University control[M]. New York: Science Press, 1913.
- [13] Wikipedia. Upton Sinclair[EB/OL].[2015-01-0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pton_Sinclair.
- [14] Sinclair U. The Goose-Step[M]. Pasadena, Calif.: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923.
- [15] Sinclair U. My cause[J]. Independent, 1903, (5).
- [16] Wikipedia. Paul Elmer More[EB/OL].[2015-01-01]. https://en.wikipedia.org/?title=Paul_Elmer_More.
- [17] More P E. Academic autocracy[J]. Nation, 1913, (5).
- [18] Wikipedia. John Burgess (political scientist)[EB/OL].[2015-01-0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Burgess_\(political_scientist\)](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Burgess_(political_scientist)).
- [19] Burgess J W. Reminiscenc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last century[J]. Columbia University Quarterly, 1913, (15).
- [20] Wikipedia. Arthur Oncken Lovejoy[EB/OL].[2015-01-0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Oncken_Lovejoy.
- [21] Dewey J. Faculty share in university control[C]. Chicago: AAU, The Seventeenth Conference, 1915.

[22]Leighton J A. Report of Committee T on place and function of faculties in universit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R].
Bulletin of the AAUP(1915-1955),1920 ,6(3).

[责任编辑：罗雯瑶]

Debate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De-administr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LIU Ai-sh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 American universities also faced the issue of de-administr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which resulted in heated debates in different sectors of American society. There were three major viewpoints, namely, radical reconstruction, modest adjustment, and rational cooperation. The radical reconstruction school was represented by Thorstein Veblen, who advocated that the governing board and president should be abolished and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be governed by professors; the modest adjustment school was represented by James McKeen Cattell, who believed that the governing board and president should be kept, but their power should be reduced drastically; the “rational cooperation” school was represented by AAUP, which argued that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maintained but there should be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dministrators and the faculty. These debates paved the way for the de-administr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ly.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de-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clude: (1) greater width and depth of such debates, (2) more rationality and patience during the process, and (3) a tentative road map of the de-administration in question.

Key words : American universities; transitional period; de-administration; reconstruction; adjustment; cooperation